

心理创伤的书写与精神家园的重建

——鲁迅《野草》阅读札记

王永兵 姚园园

内容提要 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启示,《野草》采用象征手法书写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创伤性体验,并借此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与创伤。这其中既有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的揭示,也有对现代人的孤独与绝望意识的描绘,同时还有对人与自我、人与他者关系的深度辨析,这些都源于写作主体严重的精神危机。书写创伤体验抚摸内心伤痛具有一定的文学功效,但《野草》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创伤性人生体验的书写塑造人道主义的精神界战士的自我形象,表达对美和美好生活的“凝视”,用“可悲悯的与可诅咒的”眼光重新审视国民性,并以此化解精神危机重建精神家园。

关键词 《野草》; 心理创伤; 自我形象; 精神家园; 重建

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25.01.011

谈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不提到鲁迅,谈论鲁迅不能不提到《野草》。钱理群曾说《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安魂曲”^①,写于同一时期的《野草》何尝不也是鲁迅的《安魂曲》,只不过与《朝花夕拾》的舒缓悠扬相比,《野草》显得有点激越慷慨。如果说《朝花夕拾》是鲁迅献给亲友、师长以及曾经流逝岁月的一首诗的话,那么《野草》则是其精心酿给自己的一杯烈酒,鲁迅要借这杯烈酒来化解心中压抑许久的愤懑和苦楚。《野草》思想内涵复杂、艰深、高远,表现方式丰富、新奇、精妙。《野草》书写了以作者自我为代表的现代主体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刻画了现代主体为应对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所体现的精神姿态,表达了其重建精神家园的愿望。《野草》是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超前写作,它为后来中国作家的先锋写作提供了参考借鉴的样本。

《野草》集中体现鲁迅对于历史和现实创伤性生命体验的书写。创伤书写源于创伤事件和由此引发的创伤记忆,创伤理论认为“创伤经历不是用言词表达出来,而是以精神症状的方式形诸于外”^②,因此当一个作家在经受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后必然借助文学作品加以表现,并以此来见证创伤、呈现记忆并达到自我疗救的目的。创伤理论还认为创伤具有延宕性、不可控性、反复出现等特点,闪回、梦魇、幻觉是创伤经验的常见表现方式^③。鲁迅当然不可能运用创伤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创伤理论一说,但与创伤理论有关的两位大师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对鲁迅思想与文学理念的形成及其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写作《野草》期间正是鲁迅精神遭遇巨大危机时期,较为幸运的是此时他恰好遇到

厨川白村 阅读和翻译厨川著作,让鲁迅获益匪浅。正如孙郁所说“厨川的著作在许多方面满足了鲁迅内心的需求。一是他通过性心理学说解析了艺术起源问题,即从生命欲求到受压抑的过程,看到文艺家不满现实的正当性。”“鲁迅在厨川的著作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一些文化思路是从他那里受启发而来的。比如鲁迅谈魏晋文人时用了‘药’‘女人’的提纲,这实际上是从《苦闷的象征》那里借来的。”^④在我看来,厨川给与鲁迅最大启发的是可以将压抑在心底深处的苦闷和创伤借助于梦境、幻觉等多种方式进行象征性地表达。这也是《野草》能够诞生的理论基石,否则就很难解释鲁迅文学会有如此巨变。下面就来看看鲁迅是如何运用象征手法书写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创伤性体验,并借此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与创伤。

其一是对于极度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无比狭窄、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的表现,以及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恐惧。《秋夜》仅仅用了两个意象:蓝色的“鬼睽眼天空”和四处应和着的吃吃的“夜半的笑声”,就写出了神秘而又无所不在的威胁。鲁迅曾在《我之节烈观》中将这种威胁比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这样的战士》用“无物之阵”来形象地比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疯狂与奸猾,在这“无物之阵”中充斥着各种旗帜、各样外套,并且表面上都一式点头,背地却暗藏着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一切都假模假式,你找不到对手,而对手却又无处不在。《影的告别》不仅渲染了环境的可怖,而且还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的忧虑,写出了自己置身于可怖环境中的孤独无助与“不如彷徨于无地”的极端无奈。“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⑤由于受到敌友双方的多重攻击,处于“彷徨”时期的鲁迅对周

围的一切都加以怀疑,甚至于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进化论也开始动摇,不相信有人曾许诺的“将来的黄金世界”。这不仅表明了鲁迅的清醒,而且更加说明鲁迅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体认。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文章中鲁迅曾提出两个重要的命题:一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二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为此,鲁迅借用阿尔志跋绥夫的那句名言质问那些轻易许诺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鲁迅预见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与惨痛代价:“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⑥文章的结尾鲁迅还发表了对于中国当时状况的看法,深切体悟到,原本希望通过文学来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只不过是像做了一场虚无缥缈的梦而已,而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变中国的想法更加虚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⑦鲁迅如此悲观的结论并非信口胡说,他自己和周围朋友的亲身经历将他曾经做过的五彩斑斓的梦击得粉碎。孙郁说“鲁迅一生一直在逃离的路上”^⑧,这句话如实地而又形象地反映了鲁迅的生存状况。他用文字将此记录在案,以备读者研究。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鲁迅这样说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⑨表面上信奉进化论的鲁迅未必真的就相信未来必胜于过去,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希望》中告诉人们所谓的“希望”充满了欺骗性和虚妄性,而他自己却不得不在这“不明不暗的‘虚妄’中”忍辱偷生。这是何等的幸与悲哀!

其二是对现代人“在而不属于”的孤独与绝望意识的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存在与虚无关系的深刻认识。《求乞者》运用“灰土”意象象征生命的单调乏味与孤独无助。

“剥落的高墙”、“各自走路”的行人、“拦着磕头,追着哀呼”的小乞丐,寥寥数语,不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像隔着高墙般的隔膜,而且也写出世态炎凉、人心的冷漠。“我不布施,我无布施之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与此对应的是,“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的烦腻,疑心,憎恶。”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怜悯、关爱,有的只是烦腻、疑心、憎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恶心》中的洛根丁对周围事物和存在深刻的厌恶,《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始终置身于局外,甚至将自我变为自我的陌生人,两部小说揭示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性的冷漠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阂,以及由此产生的虚无感和荒诞感。《求乞者》虽然在篇幅上与上述两部作品无法相比,但表达的主题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说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超前性与预见性。如何看待并处理“求乞”与“布施”之间的关系,如何驱逐郁积于内心深处的黑暗与虚无,这对鲁迅而言是个大问题。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来看,取与舍、存在与虚无并非互相对立排斥,而是相互依存关系;人的存在是欠缺的,虚无不是空,而是焦虑与紧张,它促使人不断地超越与创造,最终获得自由,而自由是指选择的自由,人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要对己、他人和社会负责任。《野草·题辞》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种对生与死、存在与虚无关系的辩证思维,也只有鲁迅才会拥有。《过客》再次讨论了“求乞”与“布施”的关系问题。过客向老翁讨一杯水喝,老翁的孙女不仅给过客捧出一杯水,还送给他一块布包扎伤口,但过客却谢绝了女孩的善意。他的理由是“这太多的好意,我没

法感激”,更离奇的理由是“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诅咒。”^⑩对鲁迅而言,生命本身充满欠缺以及由此带来种种不安与焦虑,如果接受别人(即使是毫无恶意)的布施,意味着更多的亏欠与焦虑不安。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与布施,这似乎成了鲁迅一个生活信条。对此,钱理群这样解释:“作为一个孤独的精神界战士,要保持思想和行动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就必须割断一切感情上的牵连,包括温情和爱,既不向人‘求乞’,同时也拒绝一切‘布施’”,鲁迅“从‘求乞’与‘布施’的背后,看到了依赖、依附与被依赖、被依附的关系”^⑪。依据这种解释,1923年与二弟周作人关系破裂被赶出八道湾胡同的鲁迅应该感到释然才对。因为从周作人方面来看,与鲁迅分手,实际上就是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对哥哥的依赖与依附,实现了人生的独立与自由。但实际情况本非如此,兄弟失和使鲁迅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他很长时间都难以振作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求乞者》是鲁迅对兄弟失和事情的一次自我反思,他从“求乞”与“布施”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的辨析中顿悟出此次事情的本质,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生活中的鲁迅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因而常常背上感情的重负而难以自拔,他只不过不喜欢亏欠他人而已,所以他绝少请求别人的帮助,但他却乐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年轻人。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曾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⑫正如鲁迅所说,他始终关注着身边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尤其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即使周作人那样无情地和他绝交,但鲁迅一有机会总会向人打探二弟的情况。到了晚年,病倒到床上的鲁迅,仍然心系苍生:“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

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⑬这里根本没有半点“居布施者之上”的烦腻、疑心、憎恶,也没有选择爱与不爱者的自由,只有对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责任与义务。外表的冷和内心的热形成鲜明的反差,鲁迅终于战胜自己内心的矛盾^⑭,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反思,实现了生命的升华。

其三是对人与自我、人与他者关系的深度辨析,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全面异化的角度写出人类精神家园的彻底荒芜,同时流露出极其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鲁迅曾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⑮鲁迅在这里所提到的“露出我的血肉”到底指什么呢?在写给自己学生李秉中的信里鲁迅这样解释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⑯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像鲁迅这样对自己如此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作家绝无仅有。早期的鲁迅深受尼采影响,《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都有尼采的影子,甚至在行文风格上都受尼采的影响,喜欢诘问,锋芒毕露,气韵冲荡,“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推崇个人主义,根本在于“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加入新文学阵营后,鲁迅也是本着“立人”的原则开始文学启蒙运动,然而理想的翅膀还没丰翼,现实的坚硬墙壁早已将他撞得头破血流,尤其是兄弟关系的失和、亲友的背叛与背道而驰,让鲁迅不得不对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并且,这种反思是从自我开始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墓碣文》这样的奇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这是将刀锋对准自己,进行

自我解剖的隐喻。思想革命也好、改造国民性也罢,一切要从自我开始,不先“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又有什么理由和信心去解剖他人照亮社会?然而,对自我进行解剖,充分地认识自我岂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这里的“本味”我认为就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到中年的鲁迅,经过人生一系列的失败,包括早期出书办刊的梦想破灭、无爱的婚姻、新文学阵营的分化瓦解、亲友的背叛、论敌的疯狂进攻,一路落荒而逃的鲁迅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这段曲折漫长而又无比艰辛的路程,即使是像鲁迅这样如此坚强的人内心也会犹豫和动摇,并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生命的本相到底是什么?用现代心理学理论解释就是自我认同危机,个体在人生发生重大变故之后,对自己是谁、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及走向感到极度的迷茫和困惑,并由此导致严重的精神危机。这其实就是鲁迅所说的自己内心的“毒气”和“鬼气”,其中也包含“怨气”。鲁迅恨自己,更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这时代有太多让他不愿意见到的人和事情。《颓败线的颤动》便是其中之一。文中的老女人为养育子女不惜卖身受尽屈辱,没想到年老的时候却遭到孩子们的“怨恨鄙夷”,极度震惊和悲愤的老女人在深夜中走出家门,“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合并: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⑰这段描写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老女人之所以离开家园独自走到无边的荒野,并用非人间的言语发出对人间最恶毒的诅咒,是

因为她感受到了她所处的“人间”其实就是“活的地狱”,是真正的“非人间”,所以她需要用“非人间”的言语来咒骂它,并与它划清界限。老妇人用最真诚、最慈爱、也是最屈辱的情感换来的却是孩子们的“怨恨鄙夷”,亲人的背叛比敌人的黑手更具杀伤力,亲情轰毁背后透露的是人性的极度阴暗与自私,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彻底荒芜,并由此导致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严重怀疑。老妇人在无边荒野中呼唤与呐喊这一意象的创造,赋予《野草》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极高的地位,它也标志着鲁迅文学由国民性批判向人性批判的创作转变。

从《野草》对于创伤性体验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文学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变,那就是文学不仅仅可以再现历史与现实,而且还可以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从再现主义到表现主义的立场转变不仅对于鲁迅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

书写创伤体验、抚摸内心的伤痛并以此来达到自我疗救,这并非鲁迅写作《野草》的真正目的。《野草》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创伤性人生体验的书写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认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错综复杂关系,在逼出内心“毒气”与“鬼气”的同时,重新确立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生命哲学,重建自我精神家园。鲁迅曾写信对萧军说《野草》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⑮,这与前述“《野草》集中体现鲁迅对于历史和现实创伤性生命体验的书写观点”相吻合。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

惊异于青年的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为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所以,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必须失掉”“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⑯这段话自然是对《野草》部分篇章最权威的解释,它为读者理解把握《野草》思想内涵和写作目的提供了线索。但这些话主要是说给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情况不太了解的外国读者听的,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其中丰富深远的内涵和意义还要靠读者自己去挖掘和发现。据此,与鲁迅自己对《野草》解释不一样的解读不应看作是对其原意的曲解,而应当看作是对原作意义的丰富与升华。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其意义的丰富性和无限性,而阐释本身就是经典意义的延伸与扩展。

首先,《野草》是写作主体在书写自我伤痛并对自我进行认真反思批判之后的自我重塑。这种重塑包括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自我奋斗目标的重新确立。在《野草》中我们能找到许多形象(意象)与写作主体有着明确的精神联系。其中之一便是《秋夜》中的“枣树”形象。文章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开篇对枣树的写法很是奇怪“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原本用“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这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却故意拆成四句话,对鲁迅这样惜字如金的作家来说,这决非可以一带而过的小事,很明显这是要拿枣树来做文章的题眼,提醒读者这绝非是一般的枣树,它们有着特别的意义。果然,全文紧紧围绕枣树而展开,先写枣树上的夜的天空,接着写周边的花草,后再写枣树“他简

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太空闪闪地鬼眈眈;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②0}“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的枣树其实是浑身带刺、桀骜不驯的,这与鲁迅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做黑暗社会捣乱者的性情完全贴合,同时枣树枝干对外表皮伤的呵护以及铁似的刺向夜空的形象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本人爱恨分明的性格特征。其二便是复仇者形象的塑造。《野草》当中的复仇者形象以及他们的复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既有手持投枪勇敢闯入“无物之阵”的战士,也有深夜中一个人在无尽的荒野以无词的言语发出恶毒诅咒地狱般人间的老女人,还有手持利刃对立旷野中双眼怒视旁观者的一男一女等。这些复仇者尽管形态各异、方式各别,但其内心都怀有巨大的创痛,他们复仇的对象也很特殊,其中有路人、亲人,以及由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组成的“无物之阵”,这种复仇不是肉体上的搏斗和较量,而是精神与灵魂的搏斗与较量,其中凸显鲁迅“精神界战士”的本色,也暗含其坚持思想革命的人生宗旨。其三则是“过客”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行进中的“战士”形象,尽管伤痕累累单枪匹马,尽管希望渺茫前途未卜,但他依然奋力前行决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苦旅”,因为他听到前边有声音在召唤着催促着他。“过客”形象可谓意味深长,它首先体现了鲁迅的历史召唤意识、担当精神和历史“中间物”意识。时代造就人,两次鸦片战争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所形成的民族集体创伤记忆,使得晚清已降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发地产生民族耻辱感和历史责任感,当拯救邦国、振兴中华的历史火炬传递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手上时,鲁迅挺身而出

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信奉进化论的他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并发出“救救孩子”呼声,主张“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②1},作为生命的“过客”的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历史的“中间物”,他愿意为后来者牺牲自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2}这就是鲁迅在文中所提到的“前面有声音在召唤着催促着他”,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需要一代人做出牺牲并发出召唤之声,鲁迅就是这样应声而起的人,他具有鲜明的历史召唤意识。“过客”意识还体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曾说到“走‘人生’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便是“穷途”。针对这两大难关,鲁迅的解决办法是遇到“歧路”先坐下歇一会,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下去;遇到“穷途”同先前遇到“歧路”一样,“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他并未遇到“全是刺丛毫无可走的地方”^{②3}。鲁迅认为人生道路虽然布满“歧路”和“穷途”,但绝不是无路可走,他也曾引用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来勉励自己,表达自己“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的决心,说白了就是“反抗绝望”。《影的告别》当中“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和《这样的战士》这当中手持投枪勇敢地走向“无物之阵”也都寓含绝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不向不幸运低头的抗争精神,是作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另类表达。

其次,《野草》还用较为隐晦的文字表达写作主体对于美和美好生活的“凝视”。这在鲁迅文学中较为少见,却可以看作鲁迅文学的终极目的。这种写作现象是鲁迅故意为之,这样优美的文字和抒情可以让其长期紧张焦虑的情绪得到短暂放松和舒缓,也可以实现表达方式和文章风格的多样化,何乐而不为?这也是为什么《雪》《好的故事》《腊

叶》等篇章许多读者读完的第一感觉是与《野草》的整体风格不相符的原因,因为它们本来就属于别样的风格。用创伤理论解释,这叫创伤的复原,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往日的美好记忆,从而直接或间接达到治疗心理创伤的目的。杰弗里·C·亚历山大还认为创伤记忆还有“认同修正”^{②4}的作用。让我们看看鲁迅是怎样想象美和美好生活的。先看《雪》。文章先写“江南的雪”的滋润美艳“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这两句可谓神来之笔,既写出“江南的雪”的细腻润滑光洁亮艳,又写出其蕴藏着青春活泼的气息,同时还预示着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总之,“江南的雪”象征着青春、美丽、希望,给人以无限美好的想象。所以接下来作者满心喜悦地写道“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这分明就是春天到来的景象!与“江南的雪”相比“朔方的雪”毫不逊色。“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如果说“江南的雪”像处子一样秀丽靓艳的话,那么“朔方的雪”则像强壮的小伙子一样刚健有力,它独立自强、奋发向上,是作者孜孜追求的“立人”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作者个体精神面貌的自况。也正因为如此,文章结尾作者不无自豪地写道:“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同《雪》的结尾一样,《腊叶》也是鲁迅的自况,许广平就是持这种观点的^{②5}。《腊叶》中有两句特别值得关注“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促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前一句,

作者以“病叶”自喻,既指身体上遭受病痛的折磨,又指精神上曾经遭受各种打击,是肉体和精神经受双重创伤的写照。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牵挂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这一句写出了鲁迅的不朽精神和伟大人格,实在是精妙绝伦!后一句暗示人生的短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每个人就像“匆匆”的过客一样倏忽而逝,实在是太遗憾了!但即使是这样一枚“病叶”,依然很美,尤其是“明眸似的向人凝视”状态。因此,《腊叶》是鲁迅的“自况”,也是自我肯定,是他对自我人生美的发现!像《腊叶》一样,《好的故事》也是一种凝视,是对“他们”的凝视。这个“他们”是一个“美丽,幽雅,有趣”的故事,故事里有“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刺奔进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②6}很难想象这样柔美的文字竟然出自鲁迅的手笔!这段描写如诗如画,营造一副天人合一、天水一色的人间仙境。难怪鲁迅“要凝视他们”。原来鲁迅文学不全都是“金刚怒目”式,它也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

再次,《野草》在审视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在审视他人和社会,这样创作主体才会更好地重塑自我形象,重建自我精神家园。自我形象要从与他者和社会关系的比照中才能得以充分地显现,因为任何个体都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同理,自我精神家园的构建也不能离开社会的整体环境改变而独自进行。说到底,人具有社会性,人对自我的改变其实就是对社会的改变。那么《野草》是如何看

待他人和社会的呢,它又是采取什么策略处理与他人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从而缓解内心的紧张焦虑,实现创伤复原的呢?《复仇(其二)》反复写道“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诅咒的。”这里面的“悲悯”和“诅咒”其实道出了鲁迅对他人和社会的新的态度和看法,也是他看待和处理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先说“悲悯”。悲悯首先是一种宗教情怀,是对芸芸众生的眷顾,是对深陷苦海生灵的渡劫,是对作恶者的宽容和慈悲,是对自我的牺牲与忏悔。《复仇(其二)》为什么会将四面的敌意看作可悲悯的和可诅咒的,重读《药》中夏瑜临死前对牢头阿义说的“可怜”两个字便可领悟:原来在(先知)革命者的心中并没有真正的仇恨,只有无尽的悲伤,他们为群众愚昧无知而痛心不已,“为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而怜悯,因为他们杀死的正是想要解放和拯救他们的人,他们自己无法拯救自己,却又亲手杀死想要拯救他们的人,这样他们只能待在地狱的深处而永世不能脱离苦海,“可悯的人们呵”,你们何时才能觉醒,怎样才能让你们觉醒?这样的悲悯是一种无计可施的悲叹,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怅惘。于是一股巨大的悲悯之气从鲁迅的内心升腾。《失掉的好地狱》同样充满宗教意味,无论是魔鬼战胜天神,还是人类战胜魔鬼,无论是天界、人界还是魔界,最不幸的始终还是那些处于最底层的鬼魂。在作者看来,既然是地狱就不存在好坏之分,而即使在“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旗旗”,如果鬼魂不能成为人,那么地狱始终还是地狱,甚至远不如人类到来之前的地狱。这让我们想起鲁迅那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②7}的名言。《风筝》写“我”对弟弟的精神虐杀,以及若干年后“我”的幡然悔悟和求宽恕而不得的缺憾。虽然写的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却给人心灵带来不小的震撼,尤

其是文章所表现的“忏悔”意识。《死火》中宁愿被燃烧尽而不愿被冻灭尤其体现鲁迅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曾多次表示自己愿像蜡烛那样燃烧自己点亮别人,自愿甘当历史的中间物。这些都是鲁迅悲悯情怀的有力的书写。其次,悲悯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鲁迅始终秉持人道主义立场,总是站在强权和恶势力的对立面替被当局打压摧残的学生和革命青年说话,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说话,替千百年来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广大女性说话。正因为如此,《秋夜》对那些苍翠得可爱可怜的死在灯火里的小青虫抱着深切的同情,“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文章中所描写的飞身赴火的小青虫让人自然地联想到那些死在敌人屠刀下的爱国青年。鲁迅一直关心青年的成长,并将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将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看作“吃人”的历史,号召广大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②8},希望青年们“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②9},“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③0}。虽然鲁迅急切希望青年勇敢站出来发光发热,做时代的先锋与楷模,但他十分爱护青年,对他们在现实当中遭受到的各种打击和伤害深表同情,并给于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一觉》中这样写道“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跟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③1}同时,鲁迅反对青年无谓地流血牺牲,要他们“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③2},主张青年打

“壕堑战”学会保护自己。而一旦这些热血青年遭到反动势力的戕害与屠杀,鲁迅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褒奖青年们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并猛烈抨击现代屠夫们的野蛮行径,控诉其滔天罪恶,《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与上面两篇文章相比,《淡淡的血痕中》显得更为深沉有力,首先它写出作恶者凶狠卑鄙而又胆怯虚伪的嘴脸“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③只有英勇无畏的学生和革命青年才敢于在废墟和荒坟上竖起反叛的大旗,踏着淡淡的血痕,迎着敌人的枪阵剑林奋勇出击。“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④文中所描写的“叛逆的猛士”形象既有对死难青年的纪念和哀悼,也有对幸存青年的勉励和对未来青年的期望。同时,“叛逆的猛士”也是鲁迅自我形象的写照,血雨腥风中敢于为爱国学生和革命青年呐喊。鲁迅的每一次写作都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他同样属于“叛逆的猛士”中的一员。也正因为与同时代的广大年轻人感同身受、生死与共,鲁迅才会更加同情死难爱国学生和革命青年,他内心的悲悯是自发的,既指向那些死难者,又指向那些幸存者,包括他自己在内。

接下来说“诅咒”。将诅咒作为处理自我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既体现了鲁迅诗人的本色,也体现出精神界战士的独特的战斗方式。首先,诅咒是觉悟后的坚决遗弃和肆意咒骂。《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得知被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子女鄙夷嫌弃后,立刻离开家门,走向无边的荒野,因为她明白面对这样薄情寡义、忘恩负义的

子女以及背后众人的冷骂和毒笑,不应该抱有任何留恋和幻想,必须和他们一刀两断,彻底的隔绝。他们不配得到布施和布施心,他们只配得到无情的诅咒!于是老妇人以“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诅咒她身后的那个罪恶的世界、那些罪恶的人!同样《复仇(其二)》中自以为“神之子”的耶稣被以色列人戏弄之后钉上十字架,面对以色列人的无知、冷酷与背叛,受难的耶稣悲悯他们的前途,仇恨他们的现在,罪孽深重的以色列人遗弃欲拯救他们的“神之子”,钉死被上帝离弃的“人之子”,他们理应受到诅咒和严厉的惩罚。其次,诅咒是觉悟后的鄙夷不屑与无情嘲讽,是灵魂深处的激烈搏斗。《复仇》中的一对男女看穿围观路人内心的极端无聊,采用特殊的方式加以报复,并“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正如文章结尾所说,这是一场“无血的大戮”,是与无聊看客们灵魂搏斗,是对其最刻毒的诅咒。《死后》巧妙借用蚂蚁爬到死人的脊梁上,苍蝇停在死人的颧骨、舔咬死人的鼻尖和嘴唇,旧书铺小伙计给死人送明版《公羊传》等几个细节无情嘲讽和诅咒冷漠麻木、极端无聊看客心理。这些看客们根本不关心人的死活,但他们却在意死亡的地点和死亡者的身份,企图在死者身上找到饭后的谈资,只要有丝毫风吹草动,他们就像蚂蚁一样纷至而来,又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实在是令人厌恶至极。《复仇》两篇和《死后》等篇章可以看作是鲁迅文学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延续,类似的文章还有《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我的失恋》,其中有对民主奴二重性和奴性意识的批判,也有对虚伪做作、喜欢逢场作戏、相互吹捧国民性的挖苦讽刺等。所有这些都归结为人性的黑暗,并由此造成社会的黑暗,鲁迅认为它们都是可诅咒的!鲁迅是一个颇具诗人气质的现代文人,他情感丰富多思多虑又多才多艺,当

他内心丰富复杂的心情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从胸中喷薄而出,而诅咒则是诗人表达内心情感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挖掘、批判国民劣根性,书写人性黑暗时并非一味地悲悯或诅咒,而是悲悯中有诅咒,诅咒中有悲悯。其中,悲悯体现鲁迅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情怀,诅咒体现鲁迅以笔为旗不屈不挠地进行灵魂搏斗的精神。于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灵魂搏斗者或者说一个人道的精神界战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结 语

人到中年的鲁迅回望自己所走过的人生旅途一定感慨良多,他需要对过去进行反思和总结,并重新规划今后的道路,往事不堪回首,前程漫漫修远,苦闷彷徨中的鲁迅恰好幸运地遇到了厨川白村和许广平,前者给了他新的理论视角,后者更是给了他创作的强大动力,她有许多疑惑需要他来解释,他有许多话语需要她来倾听,他们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于是便有了《两地书》和《野草》。《野草》通过对自我创伤性生命体验的书写不仅实现了重塑自我的目的,而且还实现了对自我与他人即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与调整,并以此重建自我精神家园。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野草》都是全新的,它是鲁迅在受到厨川白村文学理论启发下的一次大胆的写作尝试与文学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见证了鲁迅思想和鲁迅文学的变化和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变化和发展,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

注 释:

- ①①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67、277 页。
- ② [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前言第

IX 页。

- ③ [美]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④⑧ 孙郁《鲁迅与现代中国》,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5、137 页。
- ⑤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下同),第 169 页。
- ⑥⑦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67、171 页。
- ⑨⑫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21 页。
- ⑩ 鲁迅《野草·过客》,《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197 页。
- ⑫ 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81 页。
- ⑬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624 页。
- ⑭ 鲁迅曾写信对许广平说自己处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思想消长起伏的矛盾中,所以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参见《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81 页。
- ⑮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00 页。
- ⑯ 鲁迅《书信·240828 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453 页。
- ⑰ 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211 页。
- ⑱ 鲁迅《书信·341009 致萧军》,《鲁迅全集》第 13 卷,第 224 页。
- ⑲ 鲁迅《〈三闲集〉·〈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365 页。
- ⑳ 鲁迅《野草·秋夜》,《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166-167 页。
- ㉑㉒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40、145 页。
- ㉓ 鲁迅《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15-16 页。
- ㉔ Jeffrey C. Alexand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2.

(下转第 58 页)

《王阳明全集》第二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1页。

- ⑳㉑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0-414、392-394;405-411页。
- ㉒ 高迈《我国贞节堂制度的演变》,《东方杂志》第32卷第5期,1935年3月1日。
- ㉓ 李世众《列女书写、妇德规训与地域秩序——以明清乐清县志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㉔ 冯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五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 ㉕ 裘士雄等《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119-120页。
- ㉖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207页。
- ㉗ [美]康豹《精魂拘闭,谁之过乎?——道教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建构初探》,《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㉘ 李勤通、周东平《论佛教刑罚观对中国传统刑罚理念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 ㉙ [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14页。
- ㉚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173-175页。

- ㉛ 张涛《被肯定的否定——从〈清史稿·列女传〉中的妇女自杀现象看清代妇女境遇》,《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㉜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13-14页。
- ㉝㉞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00页。
- ㉟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
- ㊱ 袁世凯称帝前后(1914)、冯国璋执政期间(1917),民国政府多次发布过奖励节妇的条例。见《法令:褒扬条例(三月十一日大总统教令公布)》,《时事汇报》1914年第5期《内务总长汤化龙呈大总统修正褒扬条例及施行细则请公布文(附细则)》(中华民国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政府公报》1917年第673期。
- ㊲ 《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第六卷四号,1919年4月15日。
- ㊳ 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155页。

(作者通讯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黄爱华

(上接第49页)

- ㉔ 参见《野草·腊叶》注释[1],《鲁迅全集》第2卷,第225页。
- ㉕ 鲁迅《野草·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2卷,第190-191页。
- ㉖㉗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4、229页。
- ㉘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
- ㉙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第341页。

- ㉚ 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8-229页。
- ㉛㉜ 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鲁迅全集》第2卷,第226、226-227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小说创伤叙事研究”(21BZW124)阶段性成果

(作者通讯处: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邮编:246000)

责任编辑:黄爱华